

# 日本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在伪蒙疆的经营计划及活动述论<sup>\*</sup>

晓杰

**内容提要**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扶植了伪蒙疆政权。主要在朝鲜、伪满洲国经营农牧业的日本国策公司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触角亦伸向西部内蒙古。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蒙疆地区内进行绵羊改良;在包头附近大规模调查农业,计划开发河套地区;进行水稻种植实验,筹建包头南海子农场,计划向蒙疆移民;为侵略我国西北并继续向西扩张做物质准备工作。

**关键词**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蒙疆 缫羊改良 农业经营 日本人蒙疆移民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简称“东拓”,1908年成立之初,其事业仅限于在朝鲜进行垦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拓的触角伸向中国大陆,在上海、天津、伪满洲国等地设有分店,主要经营农牧业的同时,事业范围逐渐扩大到工业、不动产、城市基础建设等方面。随着七七事变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东拓与日军的侵略同步推进,1940年代,其活动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大陆腹部、东南亚等地。

日韩两国学者虽对东拓在朝鲜的经营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关于东拓在中国大陆的活动,日本学者仅有一些东拓在伪满洲国活动的介绍,中国学者对东拓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研究比较薄弱,至今未见研究论著问世,而关于东拓在蒙疆地区的经营计划及活动更是鲜为人知。笔者利用现阶段收集到的有关东拓在蒙疆时期的经营计划及活动资料,撰成此文,以弥补该领域的研究不足,并通过剖析东拓在蒙疆地区的经营计划和活动,从农牧业对外扩张这一特殊视角揭示战前日本的大陆政策。

## 一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及其蒙疆“进出”

1908年3月,日本第24次帝国议会通过了《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法》在此基础上,同年12月28日,设立了“在韩国经营拓殖事业为目的”的国策公司东洋拓殖株式会社,资本金1000万元,本部设在京城(现韩国首尔)。当初,其主要在朝鲜进行拓殖事业,重点进行移民和土地收购,逐渐成为朝鲜最大的地主。1918年其属下的佃农达15万人,日本投降时其在朝鲜的土地达25万町步。<sup>①</sup>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10月占领了德属南洋诸岛,11月攻占了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中国山东。东拓与日军的行动同

\*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R08003

① 1町步约为99.17公亩。[日]平凡社编:《平凡社大百科事典(10)》,东京:平凡社1985年版,第719页。

步推进，“在改善经营方法的同时，为顺应国策，通过扩大营业地域和营业项目以求事业的顺畅。政府亦认为有此必要，于是，1917年7月对该公司法进行了改正”。<sup>①</sup>以前东拓的营业地域仅限于朝鲜，新公司法规定其营业地域为“朝鲜及外国”；经营目的也由“开拓事业的经营”扩展为“开拓资金的供给以及其他相关开拓事业的经营”。同时东拓本部也于1917年10月，从朝鲜的京城移至东京。公司法改正后，东拓首先在中国东北的沈阳、大连开设了支店，开始向中国东北扩张势力。之后，其营业地域又扩张到中国内陆、东西伯利亚、南洋诸岛。到1938年12月底，东拓在中国大陆有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间岛（延边）等9处分店。<sup>②</sup>与此相适应，资本金增至2000万元。<sup>③</su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拓又在日本的南方占领地内设立了马尼拉、昭南（新加坡）、苏门达腊（印尼）等办事处。<sup>④</sup>

东拓的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等主要干部由政府任免，特别是总裁随政权的更迭而经常变换。第一代总裁为军人出身的宇佐川一正男，以后多起用有殖民地行政经验的官员。政党政治时期（1924—1932），总裁由财界选出。理事、监事等最初多是中央省厅的“下凡”者，即中央省厅退职后，担任东拓的理事、监事。1931年以后，开始在公司内部选拔。可以说，东拓集中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精英”。大正时代（1912—1926），大学毕业生在日本社会仍是麟毛凤角，东拓每年就从帝国大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社员。另外，还从东洋协会专科学校、东亚同文书院、哈尔滨学院的毕业生中选拔社员。<sup>⑤</sup>

东拓在进行长期拓殖资金融资的同时，还直接经营农地、牧场、盐场等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的各种事业。从大正末期开始，通过直接经营或融资的方式设立了矿产业、水利发电事业、酒精制造、纺织、造船、制铁等各种工矿业公司。特别是随着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其所营企业为适应军需要求均获得膨胀式发展。到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6月，其下属的相关公司达83家，总资本金额近2.6亿元。企业类别为矿业16家；电气业3家；金属制造业3家，造船业4家，其他工业7家，铁路公司2家，酒精工厂3家，纺织工厂4家，面粉厂2家，林产业7家，水产公司1家，畜产公司2家，不动产业公司8家，农事公司10家，拓殖公司11家。<sup>⑥</sup>可以说，东拓的扩张发展与日本军部的不断对外侵略同步进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发动察哈尔战役，从8月末到10月中旬，相继侵占了张家口、大同、归绥等地。随后在这些地区分别成立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自治政府3个伪政权。11月22日，成立了控制上述3个伪政权重要产业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在经济领域完成了对3个伪政权的统合。1939年9月1日，又将3个伪政权合并，成立了受日本驻蒙军“指道”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8月改称“蒙古自治邦”，现在一般称之为“伪蒙疆政权”。

当时的伪蒙疆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对日本而言，是阻止可能出现的苏联军队从新疆东进、或从外蒙古南下的重要屏障；而且，在割断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联系方面也处于重要地位，是所谓重要的“特殊防共地带”。<sup>⑦</sup>另外，由蒙疆西经宁夏、新疆可通往印度及中亚，从战略角度看，蒙疆是

<sup>①</sup> [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编：《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三〇年志》，东京：东洋拓殖株式会社1939年版，第10页。

<sup>②</sup> [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编：《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三〇年志》，东京：东洋拓殖株式会社1939年版，第13页。

<sup>③</sup> [日]大河内一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的终焉》，东京：绩文堂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12页。

<sup>④</sup> [日]大河内一雄：《消逝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2年版，第243—252页。

<sup>⑤</sup> [日]大河内一雄：《消逝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2年版，第14页。

<sup>⑥</sup> [日]大河内一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的终焉》，东京：绩文堂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12—13页。

<sup>⑦</sup> [日]平竹传三：《蒙疆建设论》《蒙古》1940年6月号，第12页。

日本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来北上、西进的重要基地。<sup>①</sup>因此,日本认为维持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非常必要。

就经济方面而言,日本认为“蒙疆在资金、人力、物力等所有方面,必须依赖日本,否则其经济活动将无法进行。蒙疆作为广义上的高度国防国家,其意义并不在于经济上如何自立,而在于帮助东亚共荣圈繁荣发展”。<sup>②</sup>即日本欲将该地区作为工业原料及军需物资的基地为“东亚共荣圈的繁荣发展”出力。因此,蒙疆地区实为“日本(以及伪满洲国)的原料供给市场、日本商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日本资本的输出市场……但作为商品销售市场及资本输出市场的作用是第二位的”。<sup>③</sup>日本的主要目的仍是将蒙疆当做日本及伪满洲国的原料供给地。

内蒙古西部、察南、晋北所谓“蒙疆”地域,盛产铁矿石、煤炭、粮食、鸦片以及羊、马、牛等牲畜及畜产品。这些大都是当时日本国内极其缺乏并且是进行对外扩张战争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日本认为“应由蒙疆供给的原料品第一是国防工业、重工业的基本原料,尤其是铁矿石和煤炭。第二是重要的军需资源羊毛……我国仅能大体自给的重工业基本原料煤炭,随着需求的增大凭国内的供给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九一八事变后形成日满经济圈虽一时提供了丰富的铁矿石和煤炭,但随着后来军事国防产业的发展以及日中事变的发生、发展,国防资源依然不能摆脱依赖海外市场状态”。<sup>④</sup>

当时,日本的战略物资主要依靠从美国进口。但是,美国于1939年7月通知日本,6个月后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1940年7月又宣布对武器、军需物资和飞机零件等实行输出许可制,使日本战争经济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日本迫切地想夺取南洋资源,实现经济自给。1940年春夏之交,日本进一步确定了“北守南进”的政策。<sup>⑤</sup>1940年9月,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北部并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日美关系更趋紧张。因此,美国加强了限制对日本的战略物资输出力度。日本一方面为夺取南洋的资源准备对美国开战,同时也计划在不依靠海外市场的前提下,尽量充实提高国防。所以,在日元经济圈内获得日本及伪满洲国必要的国防资源显得非常重要。于是,占领地“蒙疆作为矿产资源及羊毛资源的供给地,在日满华经济圈内所处地位愈显重要”。<sup>⑥</sup>

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战争提供农畜产品资源,是东拓在蒙疆进行农牧业开发的宗旨。所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作为日本第二大国策会社,积极配合日本政府、军部的对外军事、经济扩张战略,在蒙疆地区内进行绵羊改良;在包头附近进行大规模农业调查,计划开发河套地区;设立农场,进行水稻实验,并计划向蒙疆移民,为侵略我国西北并继续向西扩张做物质准备工作。

## 二 “东拓”在蒙疆的经营计划及活动

### (一) 东拓的蒙疆经营计划

1917年7月《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法》改正后,东拓开始向我国东北、河北、山东、江苏以及南洋

<sup>①</sup> [日]中村信:《蒙疆的经济》,东京:有光社1941年版,第4—5页。

<sup>②</sup> [日]中村信:《蒙疆的经济》,东京:有光社1941年版,第10—11页。

<sup>③</sup> [日]杨井克巳:《蒙古经济资源论》,东京:三笠书房1941年版,第56—57页。

<sup>④</sup> [日]杨井克巳:《蒙古经济资源论》,东京:三笠书房1941年版,第58页。

<sup>⑤</sup>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4)日中战争(下)》,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84—199页。

<sup>⑥</sup> [日]川村得三:《蒙疆经济地理》,东京:丛文阁1941年版,第21页。

等地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 20 年代在我国东北扩大投资失败后<sup>①</sup>, 特别是 1936 年 12 月 1 日日本在伪满洲国取消治外法权以及归还满铁附属地, 东拓在东北的事业前途黯淡, 为此, 开始向华北发展, 以求活路。1936 年东拓试图投资张家口的电力事业, 后由于中国方面保护国权以及政局不稳等因素, 被迫停止。<sup>②</sup>

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 东拓的触角正式伸向内蒙古西部, 对蒙疆的投资重新开始。1939 年 2 月 18 日, 东拓在张家口设立了有 6 名职员的临时办事处, 负责蒙疆地区的对外联络、调查、计划以及其他事务, 办事处主任为原东拓奉天分店长宇贺治孝臣。宇贺治孝臣到任后, 就蒙疆的历史沿革、当时的治安状况、政治形势、蒙疆的政权体制、土地制度、其他日系会社在蒙疆的活动情况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后, 向东拓本部提出了《关于在蒙疆地方发展社业之件》<sup>③</sup>, 主张东拓应参与蒙疆的畜产经营、农业开发、都市基础建设等工作。

在驻蒙军、蒙疆联合委员会、兴亚院等各方面联合请求下, 依照东拓社法第六条, 在取得日本拓务省同意后, 东拓于 1939 年 8 月将临时办事处升格为张家口分店。于是, 扩大机构、增加人员。人员构成为分店长 1 人, 次长 1 人, 技师 2 人, 书记 2 人, 翻译 1 人, 雇员 2 人, 书记补(打字员) 1 人, 共 10 人, 年经费预算为 5.2 万元。<sup>④</sup> 东拓办事处时代即对蒙疆的牧业、农业等进行了调查, 1939 年 6 月制订了在蒙疆的事业计划, 主要有畜牧业经营、农业开垦、土地改良; 林业开发; 都市基础建设; 萨拉齐方面农业调查, 建立酒精工厂等。

东拓是日本的国策会社, 资金充裕, 并自携资金进入蒙疆, 且取得了拓务省的认可, 也取得了兴亚院经济部(1938 年 12 月 16 日设置)和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承认。由于伪蒙疆当时没有进行长期投资的特殊会社, 故能从日本调集充裕资金的东拓进入蒙疆, 大受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欢迎。但是, 东拓在蒙疆的电力投资和都市基础建设计划却落空了。

日军占领张家口后, 东拓欲重续前业, 在张家口进行电力投资, 但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8 年 4 月 21 日成立了“蒙疆电业株式会社”后, 东拓的蒙疆事业目标改为经营畜牧业、农事以及城市基础建设等。在城市基本建设方面, 东拓欲利用其相关公司满洲房屋株式会社(1938 年 2 月 19 日设立)和负责东拓保有地管理的同鸿株式会社(1926 年设立, 1939 年 4 月 1 日改组为东拓土地建筑物株式会社)进行蒙疆的都市经营。正在东拓与蒙疆联合委员会交涉之际, 伪蒙疆政府决定设立从事该项工作的新公司。因为由东拓出资与政府之间的折中需要时间, 所以由蒙疆联合委员会和蒙疆银行以及 3 个伪政权共同出资 1000 万元, 设立了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统制性特殊公司从事蒙疆的都市经营, 东拓参与蒙疆都市经营建设的计划遂成泡影。<sup>⑤</sup> 因此, 东拓在蒙疆最后实施的事业仅有畜牧业和农业经营两项。

## (二) 畜牧业经营

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畜产资源极为匮乏。以羊毛为例, 军需民用羊毛几乎全部从澳洲进口。

<sup>①</sup> 东拓根据日本政府、军部一战时期制定的扩展计划, 与满铁等合作, 通过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向中国东北移民, 进行水田开发, 但效果并不理想。另外, 东拓计划修建的连接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天图(天宝山——图们江之间 60 英里)轻便铁路, 由于中国方面的反对而延迟。因而, 东拓为解决经营危机, 不得不暂时缩小在中国东北的活动(详见〔日〕中村政则编:《日本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国际化与地域》,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2 年版, 第 97—118 页)。

<sup>②</sup> 〔日〕柴田善雅编:《日本的蒙疆占领》, 东京:研文社 2007 年版, 第 29 页。

<sup>③</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 《东拓在蒙疆地域情报调查之件》, 1939 年(该资料系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电子化资料, 查询编码: B06050259900, 网址: <http://www.jacrc.go.jp>, 以下本文引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史料皆出该网址)。

<sup>④</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 《关于东拓张家口支店设立之件》, 1939 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查询编码: B06050314000)。

<sup>⑤</sup> 〔日〕柴田善雅编:《日本的蒙疆占领》, 东京:研文社 2007 年版, 第 256—258 页。

1937年,日本国内年产羊毛约15万公斤,但同年进口羊毛1.1亿公斤,当年支出外汇2.9亿元。<sup>①</sup>日本侵占蒙疆地区后,该地区成为日本占领地中最大的畜产基地,饲养着近400万只绵羊以及大量的马、牛等牲畜。<sup>②</sup>但是,当时该地区所饲养的原种蒙古绵羊产毛量低、毛质差,不适合作毛纺工业原料。所以,日本从国防的角度出发,为逐渐达到羊毛自给和节约由于进口羊毛而支出的巨额外汇,欲将蒙疆作为绵羊改良的基地,企图通过对原种蒙古绵羊进行改良,以达增加产毛量及改善毛质之目的,为日本提供军需民用羊毛。为此,1938年10月8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制定《蒙疆畜产政策要纲》<sup>③</sup>,提出蒙疆的畜产方针:“鉴于蒙疆地区之畜产在国防及产业上的特殊重要性,以马和绵羊为重点力求振兴畜产,以适应军事上的需求并提高民生。为此,决定把通过增加牲畜头数、改良品种作为振兴畜产的主要方向。”

关于牲畜改良,日本认为“鉴于蒙疆牧业在东亚经济圈的国防及产业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进行马与绵羊的改良事业,无论从军事的角度还是提高民生的角度,都是当前必抓之大事”。具体到绵羊改良,则为达到增产羊毛之目的,改良品种主要使用毛肉兼用型的考历代种羊<sup>④</sup>改良原种蒙古绵羊,以改善原种羊的毛质和增加产毛量。即打着提高民生、复兴蒙古的幌子,企图将肉皮兼用型的蒙古原种绵羊改良为毛用型,以便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急需的羊毛资源。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军部希望增加羊毛产量,以尽快摆脱军需羊毛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为此,1938年9月,日本企画院制定了《羊毛生产力扩充大纲计划》力图“在日满及华北、蒙疆进行绵羊的改良增殖,在适应国防资源增长要求的同时,改善国际收支、节约外汇”。该大纲规定从“1938到1946年的9年间,在日本北海道及朝鲜输入种绵羊使之增殖;在满洲及华北、蒙疆对原种绵羊进行改良增殖”。到1946年时,在日本、伪满、伪蒙疆、朝鲜、华北地区内,改良种加原种绵羊的保有数达到2450万只,年产羊毛4115万公斤。<sup>⑤</sup>关于蒙疆地区具体规定:“在蒙疆迅速制定并实施绵羊改良增产计划,到昭和21年(1946年),要达到改良种绵羊存栏200万只,年生产羊毛480万公斤的水平,为实现此目标所需的改良种公羊由内地(指日本)及朝鲜提供。”<sup>⑥</sup>

为贯彻蒙疆联合委员会于1938年11月28日制定的《蒙疆羊毛改良方策要纲》<sup>⑦</sup>,计划“到成纪741年(1946年),必须确保改良绵羊存栏数达235万只,年产改良羊毛525万公斤,从日本、澳洲或新西兰输入种绵羊,对原种绵羊进行改良”。该要纲规定在政府的监督指导下从事蒙疆的绵羊增殖改良事业,以设立民营特殊会社的方式经营。

1939年5月,在驻蒙军参谋长主持下,召开了蒙疆畜产振兴会议。决定“以羊毛改良为主,绵羊的增殖为辅,利用8年时间以增产226万只绵羊和年产500万公斤羊毛为最低目标,可能的话,在5年内实现该计划”;并规定“该事业以民营为主,通过设立特殊公司在政府的监督下运营,8年

<sup>①</sup> [日]大阪市产业部编:《羊毛的需给统制》,大阪:大阪市产业部1938年版,第5页。

<sup>②</sup> [日]兴亚院编:《蒙疆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东京:兴亚院1940年版,第60页。

<sup>③</sup> [日]满铁调查部编:《蒙疆政府公文集(下辑)》,大连:满铁调查部1939年版,第218—222页。

<sup>④</sup> 考历代种羊:即コリデール种羊(Corriedale),绵羊品种之一,是新西兰的考历代牧场培育的毛肉兼用型绵羊。该种羊体质强健、适应性强、耐粗饲料;肉质良好,每头年产毛量4—7公斤。日本1914年后开始输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饲养大部分绵羊为考历代种。[日]平凡社:《大百科事典(5)》,东京:平凡社1995年版,第1143页。

<sup>⑤</sup> [日]木川茂行:《大东亚共荣圈纤维资源概观(第一部羊毛资源,第一辑本邦之部)》,东京:毛织物中央配给统制株式会社调查课1943年版,第3—4页;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羊毛生产力扩充大纲计划》,1938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5016226700)。

<sup>⑥</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羊毛生产力扩充大纲计划》,1938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5016226700)。

<sup>⑦</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关于东拓绵羊改良增殖事业之件》分割1,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58600)。

间输入种公羊 12万只,为此设立 9处种羊场,在各个旗县设立种羊配给所”。<sup>①</sup> 即是说,蒙疆地区担负着日满华经济圈内改良绵羊数量的约 20% 和改良羊毛产量的近 20% 的“重任”。

当时在蒙疆地区进行绵羊改良的有伪蒙疆政府、善邻协会、东亚绵羊协会以及东洋拓殖株式会社、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大蒙公司、蒙疆畜产公司等数家日系公司。<sup>②</sup> 其实,早在 1933年东拓即在朝鲜的咸镜北道庆源郡设立了庆源牧场,以后又陆续设立了稳城、训戎、谷山、庆源第二牧场等。<sup>③</sup> 1938年底,东洋拓殖株式会在朝鲜拥有 8443只绵羊,大部分为考历代种。<sup>④</sup>

最初东拓张家口分店为在蒙疆发展牧羊业,对蒙疆家畜饲养状况进行了调查,计划设立绵羊牧场,从朝鲜的东拓牧场输入种绵羊。但是,1939年 4月 10日,伪蒙疆政府颁布了《民营牧场取缔令》规定除当地住民外,开设经营牧场时,必须取得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许可。蒙疆畜产振兴会议后,东拓放弃了自建牧场的计划,接受了当时伪蒙疆政府实施的绵羊改良增殖计划,并为此制定了《蒙疆绵羊改良增殖实施计划书》。该计划书规定:为在蒙疆实现羊毛增产,从日本输入种羊,设立种羊场,利用输入种羊与本地原种羊交配进行改良;同时,计划收购羊毛、驼毛、以及各种皮张;为此计划在张家口设立“东拓蒙古畜羊局”,主管该项事务。<sup>⑤</sup> 该计划得到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认可,但计划中的“东拓蒙古畜羊局”后来并没有建立起来。

东拓在蒙疆经营种羊场的最初三年,共有 162.8万元的亏损。1939年 8月 7日,东拓向蒙疆联合委员会提出了亏损补助金申请,同月 28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同意其申请,答应亏损额由伪蒙疆政府全额负担。<sup>⑥</sup> 故而,东拓在蒙疆的绵羊改良事业属于无风险投资。

1940年 7月,东拓在德化县新民乡(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设立了 3000町步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德化牧羊场。人员构成为以场长为首的日系技师、技术员 3人,雇用当地警备员、司机、牧夫等 10人。场内建筑为事务所兼宿舍 1栋,羊舍 4栋,药浴场 1个,并拥有 50町步的饲料种植基地。

1940年 9月,东拓投资 66495元,从其在朝鲜的牧场及日本购入考历代种羊 1009只,除因中途运输累病的 449只留在牧场内饲养外,其余的 560只在 9—10月间贷放到张北县、尚义县、德化县、商都县、崇礼县、上都旗等地。县府组织使之与农家的原种母羊交配,交配之后种公羊交回德化牧羊场,翌年配种期间再贷放。

该牧羊场的《种绵羊贷放规约》在当时进行蒙疆绵羊改良的日系会社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其内容如下:

第一,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以下称东拓)为力图实现蒙疆地区的绵羊改良增殖,根据本规约将种公绵羊贷放给察哈尔公署(以下简称盟公署)。

第二,盟公署接受种公绵羊贷放时,每年七月末前根据另纸样式第一号提出贷放申请书。

第三,种公绵羊贷放期间即为配种实施期间,但认为有必要时,贷放期间可以延长或缩短。

第四,由贷放种公绵羊产出的羊毛归东拓所有。

第五,由贷放种公羊经配种后所产之羔羊,每一头种公羊第一次杂交后所产如果是母羔、第二

<sup>①</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张家口驻在主任关于情况汇报之件》分割 1,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 B06050260000)。

<sup>②</sup> 见拙文《伪蒙疆政权的绵羊改良活动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 10期,第 73—80页。

<sup>③</sup> 见拙文《朝鲜牧羊业与日本的殖民统治》,《史学集刊》2008年第 2期,第 61—67页。

<sup>④</sup> [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编:《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三〇年志》,东京: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1939年版,第 184页。

<sup>⑤</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关于东拓绵羊改良增殖事业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 B06050258600)。

<sup>⑥</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关于东拓绵羊改良增殖事业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 B06050258600)。

次杂交后所产如果是公羔的话,每年向东拓缴纳一头。东拓将之饲育后施行再贷放。

第六, 贷放种公羊的接受、交还以及第五项生产羊羔的缴纳和在贷放期间所需要的饲育管理等费用由盟公署负担。

第七, 贷放种公羊如果有变动时,迅速将变动的原因向东拓汇报。

第八, 接受种公羊时,按照另纸样式第二号提出接受证。

第九, 接受贷放方违反本要领或是疏忽怠慢贷放种公羊的饲育管理时,东拓将取消种公羊贷放。

第十, 贷放种公羊的繁殖成绩按照另纸样式第三号每年六月末前向东拓报告。

伪蒙疆政府、东拓等日系会社从增产羊毛的日本国策出发,自1939年末到1940年,投资一百几十万元,从日本、朝鲜、新西兰等地输入了4495只种绵羊<sup>①</sup>,并将之贷放到民间。但是,输入绵羊被本地羊间流行的羊痘、疥癣等疾病所传染,大部分死亡;少数幸存的也因1941年的春寒和雪灾未能幸免。轰轰烈烈的蒙疆绵羊改良事业,最后以“输入绵羊不能适应当地严酷的自然环境”告终。

此次绵羊改良活动失败的原因,从技术层面上看主要是输入绵羊本身的资质不良、输入时期不当、当地驯化不充分及营养缺乏、技术指导人员不足、病虫害的发生等。<sup>②</sup>此外,以民间会社作为绵羊改良事业主体之本身也存在着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弱点。进行绵羊改良,应有长期投资、短期内很难收益的精神准备。因此,投资绵羊改良对以半年为期进行决算的商业会社来讲,可以说并不适当。即由商社经营绵羊改良事业时,它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节约经费之意识,自身就会限制诸如充实技术人员、彻底指导、增添卫生设施以及其他消耗性投资。

为了克服绵羊改良事业“内在之弱点”,重振蒙疆的绵羊改良事业,1941年10月,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重新制定了《蒙疆临时产业建设基本五年计划(羊毛)》除修正蒙疆的绵羊改良计划外,特别强调进行蒙疆绵羊改良,“首先应该慎重考虑的是如何选定从事该项事业的主体”;新计划开始考虑“在必须选择强有力机构这一点上,应该选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无视核算的政府机构或能够代替政府机能的机构为该项事业的主体”<sup>③</sup>;决定成立蒙疆绵羊改良事业的统制机关,设立财团法人“蒙古绵羊协会”,“作为指导机关和政府的代理机构担当牧羊国策的重任,指导蒙疆的绵羊改良事业”。<sup>④</sup>

在日本的策划下,1941年10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颁布了“蒙古绵羊协会法”。10月24日,正式设立了财团法人蒙古绵羊协会。<sup>⑤</sup>财团法人蒙古绵羊协会的章程规定:“本协会是为力图实现蒙疆地区内的绵羊改良增殖,以资提高民生,同时顺应羊毛需求为目的而设立的绵羊改良增殖指导奖励机构。”其中,关于增殖的事业是以达到预防阻碍绵羊增殖的各种疾病和重点防除雪寒;在改良方面通过用考历代种公羊与蒙古原种母羊之交配,达到改良原种羊,增产羊毛之目的。<sup>⑥</sup>蒙古绵羊协会成立后,此前自由主义色彩相对浓厚、多元实施的蒙疆绵羊改良事业,就置于蒙古绵羊协会的一元化统制之下。<sup>⑦</sup>

但是,鉴于个别日系会社在绵羊改良事业方面所做的贡献,同意东拓在德化县、钟纺在康保县

<sup>①</sup> [日]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编:《蒙疆绵羊改良增殖状况报告书》,东京1943年版,第119页。

<sup>②</sup> [日]在张家口大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蒙古牧业政策的沿革及现状》,张家口1944年版,第15—18页。

<sup>③</sup> [日]在张家口大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蒙古牧业政策的沿革及现状》,张家口1944年版,第19页。

<sup>④</sup> [日]毛织物中央配给统制株式会社调查课编:《大东亚共荣圈纤维资源概观(第一部羊毛资源,第三辑支那之部)》,东京:毛织物中央配给统制株式会社1943年版,第35页。

<sup>⑤</sup> [日]财团法人东亚绵羊协会编:《东亚绵羊协会概要》,东京:东亚绵羊协会1942年版,第28页。

<sup>⑥</sup> [日]蒙疆新闻社编:《蒙疆年鉴》,蒙疆新闻社1943年版,第252页。

<sup>⑦</sup> 见拙文《伪蒙疆蒙古绵羊协会始末》,《古今农业》2007年第3期,第96—104页。

的牧场可以继续保留,策应伪蒙疆政府的绵羊改良计划,进行绵羊改良活动。1945年8月苏蒙联军进攻张家口时,德化牧羊场拥有绵羊2000只,附近民众哄抢该牧羊场,牧场技术员门山被杀。<sup>①</sup>

### (三)农业经营计划及活动

东拓在蒙疆的农业经营计划为土地开垦、改良、利用;经营农场,包括各种作物的实验栽培、主要作物品种以及耕地的改良增产、特殊作物的改良增产、农业合理化经营,并提供农业经营和拓殖事业资金。<sup>②</sup>当时,东拓在蒙疆实施的农业经营计划和活动主要有萨拉齐附近的农业调查、新农农业实验场的改造利用;民生渠改造以及在包头南海子设立包头农场等项目。

东拓认为蒙疆的农业经营地域从长远考虑应以巴彦塔拉盟的萨拉齐平原、五原平原及鄂尔多斯平原为对象,但五原、鄂尔多斯两地当时只在行政地图上属于伪蒙疆的伊克昭盟管辖,实际处于傅作义以及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的控制之下,所以东拓最初的农业经营地域仅限于萨拉齐附近。

东拓认为萨拉齐、托克托平原虽开垦已久,但作物栽培及耕作方法落后,处于原始农业阶段。“对该地区进行开发垦殖建立各种先进农业设施不仅增进农民福利,更具有西方工作(亦称“西北工作”,即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按既定的政策向中国西北地区扩张的计划与活动。)上的兵站基地以及产业基地的重要性”。<sup>③</sup>显然,开垦该地区的根本目的是为侵略中国西北并继续向西扩张做物质准备工作。

1929年,绥远省政府在“自养”、“自卫”、“自治”的口号下,通过组织模范新村以资推进西北农垦工作,于萨拉齐县设立了新农农业实验场。从美国输入农用拖拉机、收割机等大型农业机械,计划在该农场实行畜牧业及畜产加工,并设立附属农业学校,欲进行大规模集约农业经营。但是,事前调查论证工作不充分,该地域属于碱性土壤,地下水水质亦差,加之年均降雨量较少,所以一开始该农场经营即陷入困境。<sup>④</sup>再加之战乱,后逐渐荒芜,成为附近农民的放牧地。

东拓的蒙疆农业经营首先将视线瞄在萨拉齐,在萨拉齐设立据点,并在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最高顾问宇山兵士的斡旋下由军方提供警备,与萨拉齐县公署取得联系,从东拓的各个分店调集十几名调查员及翻译组成调查团,调查费预算4万元。内分农业班、农业土木班、畜产班等,从1939年5月15日到7月20日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调查内容为新农试验场调查、民生渠改造调查等,得出新农实验场可继续利用的结论并提出了民生渠改造计划,制定了《萨拉齐县新农实验场利用计划书》。<sup>⑤</sup>

该计划书认为,虽然这里土地属于碱性土壤,并有无法利用民生渠之水进行灌溉的不利因素,但因地制宜,该农场仍有继续利用之价值。即在可耕地内栽培高粱、糜子、莜麦、大豆等普通民需的耐旱性作物及饲料作物燕麦、紫花苜蓿等,以便为日军提供军需饲料。将不可耕地充作牧畜用地,一方面设立农场直接经营的牧场,进行牛、马、绵羊、猪的饲养改良;另一方面,将这一部分土地充做附近租地农民的共同放牧场所。此外,计划在该地区内设立苗圃,种植防风、防沙林,并制定了各年度的具体实施目标。

<sup>①</sup> [日]大河内一雄:《消逝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2年版,第260页。

<sup>②</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在蒙疆地域情报调查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59900)。

<sup>③</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在蒙疆地域情报调查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59900)。

<sup>④</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张家口驻在主任关于情况汇报之件》分割2,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码:B06050260100)。

<sup>⑤</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在蒙疆地域情报调查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59900)。

早在1929年,萨拉齐县遭遇大旱,饥民遍野。由中美两国合办的“华洋义赈会”,对灾民实行以工代赈,开挖了70公里长的“民生渠”。该渠西起黄河畔的镫口村,东至托克托县境内,再入黄河,故亦称萨托民生渠,目的是灌溉境内4万公顷的耕地。但是,当年开挖时,由于美国工程师兼主持人塔德,在渠道的工程测量和设计上有误差,导致渠建成后,形成河低渠高,渠低地高,灌溉用不上,农民未受到水利之惠,农田照样遭受干旱之苦,所以人们把民生渠称之为“民死渠”。自开挖后一直死死地躺在那里,并且缺坏之处日增,沿渠土地荒芜,农业不振。

东拓认为蒙疆耕地缺乏,萨拉齐附近是蒙疆的农业宝库,该地的农业开发至关重要,实现其农业增产对维持日本在蒙疆的殖民统治意义重大。遂于调查后,制定了民生渠改造及经营计划,预计改造后的民生渠可灌溉土地约7万町步。但是,改造所需经费庞大,东拓亦无力独担此任,于是提出在政府号召下让受惠地区的农耕者组成水利合作社经营的计划。由东拓负责改造调查、设计测量以及施工并提供水利合作社所需资金的融资。<sup>①</sup>

东拓计划改造民生渠的同时,在受惠地区内设立实验农场,通过实验栽培各种农作物、改良品种及耕种方法,选定宜植作物,改良家畜及其饲养方法,建立苗圃,进行多种农业经营促进农业开发。同时,提出以当地住民为主,在该地逐步增设实验农场,培养自耕农。鉴于蒙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提出应适当地从日本内地移民至此,作为建立实验农场的骨干。从政治、军事意义上讲,这将是日本向河套、鄂尔多斯方面战略进攻的立脚点,潜在意义重大。<sup>②</sup>

为此,东拓计划选定萨拉齐县第一、二、四区内民生渠南侧的地域作为建立实验农场的第一次计划用地,农场面积8.5万町步。在土地取得方法上,鉴于当地土地制度的复杂性,东拓认为如果从法制上直接取得困难的话,采取由政府出面收购,然后委托东拓经营或租赁给东拓经营的形式,土地取得资金由东拓支付。<sup>③</sup>

实验农场的经营形态采取东拓直接经营地、当地人的出租地以及日本移民移住地三种方式经营。其中,关于日本人移民地方面规定:由于该地处于西方工作的要冲,有必要在该地农业指导上适当地从日本内地派遣移民。蒙疆与北满相比,自然条件优越,对日本内地人来说完全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先将日本移民送到实验农场,熟悉当地环境后,让其成为自耕农或通过别的方式分配给其土地。计划第一次接受日本移民户数为50户,接受地预定面积为1000町步,一户平均面积20町步,形成50户规模的日本移民村,移民时间定为1940年。<sup>④</sup>

东拓对该计划实施的效果进行了积极的预测。他们认为:“民生渠改造以及农事实验场的细胞化会带来地方农业的增产,提高农民的福利,使农、畜、林业全面发展,由此带动与此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促进贸易繁荣;同时民生渠改造还会带来交通、运输线路的扩充,与日本人的入殖、原居住农民的生活安定密切相关,促进地方治安的维持改善;作为对西方工作的据点,该事业的顺利进行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将来推进西方工作上期待发挥更大的作用。”<sup>⑤</sup>

<sup>①</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在蒙疆地域情报调查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59900)。

<sup>②</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在蒙疆地域情报调查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59900)。

<sup>③</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在蒙疆地域情报调查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59900)。

<sup>④</sup> [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在蒙疆地域情报调查之件》,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59900)。

<sup>⑤</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张家口驻在主任关于情况汇报之件》分割1,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60000)。

由于民生渠改造及建立实验农场工程浩大,技术、资金缺口较大,作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计划该事业以五年为一期,五年后继续改造。民生渠的改造与建立农事实验场密不可分,并希望以此为核心向西方扩展业务,还计划将来在适当的时期,设立强有力机构如特殊会社(如伪满洲国的土地开发会社)等进行专门运营。<sup>①</sup>随着1945年日本投降,该计划半途而废。

后来随着蒙疆治安的安定,东拓在蒙疆的胃口也欲壑难填。土地调查扩大到包头市以东、阴山山脉以北、南到黄河流域的30万町步范围内。由于包头附近土壤属于碱性土壤,东拓计划利用黄河之水进行灌溉,在大范围内栽培水稻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其改造为水田或旱田。1942年进入了测量和土地收购阶段,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蒙古人,土地耕作权属于汉人,土地收购进展很困难。到1943年4月,完成了1700公顷的土地收购工作<sup>②</sup>,开始建造农场。首先计划建立的就是包头南海子农场。

早在1939年12月27日,东拓张家口分店就制定了《设立包头南海子农场计划书》,规定设置包头南海子农场的宗旨为“以日中事变为契机,本地域成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要冲。但是,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产业经济处于发展阶段,生活必需品大多数依靠外地输入。特别是近来日本人入蒙者剧增以及军需用粮、食用米生产的重要性日益紧迫。并且考虑到将来西方工作,采取积极的自给政策,实施农业生产的增产改良,可以说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鉴于此,本社一马当先,开垦距包头市区东南六公里处南海子以东的黄河左岸的荒芜之地,设立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场,在为当地食用米自给做贡献的同时,也为将来日本企业向西方延伸时进行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实验”。<sup>③</sup>

计划对建设地进行灌溉、排水、防水等水利、土木工程等施工建设;改造盐碱地,开垦水田、旱田,将其大部分出租给汉族移民,一小部分收容日本人作为指导移民,创立自耕农制进行经营。计划用地涉及到原巴彦塔拉盟土默特旗的开发地,以及原住汉人的个人所有地,共1890公顷,经伪政府当局斡旋,将其收购。预计开发水田1000公顷,旱地600公顷,计划移入汉人租佃农370户,移入日本人开拓民60户。日本指导移民援引《拓务省满洲移民助成条例》每户发旅费350元,农业经营费150元,共计500元。租佃农、自耕农的经营资金最初3年除建筑费之外,耕牛、农具等由东拓融资提供。工程计划总投资额包括土地收购、改良、建筑及贷放资金等合计147万元<sup>④</sup>,随即向伪蒙疆政府提出了设立许可申请。

1940年6月3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总务部指令第22号的形式,发布《包头南海子农场设置许可之件》规定“成纪734年12月27日申请之件在附加左记条件下认可”。即“农场经营地域为京包线(不包括铁道用地)以南的地区;京包线北侧的开拓工事中止之际,水田经营面积要达到800公顷;关于农场经营计划以及其运行必须以政府的农林生产物增产计划为基准,并必须接受政府的指导;开拓工程必须在计划年度内完成;租佃农移民只限于蒙疆地域内在住的农民;该农场内组织农业团体时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等6项。<sup>⑤</sup>

根据东拓社法规定,作为国策公司设立新机构必须征得政府同意并备案,于是,1940年6月19

<sup>①</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东拓张家口驻在主任关于情况汇报之件》分割1,1939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260000)。

<sup>②</sup> [日]大河内一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的终焉》,东京:绩文堂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151页。

<sup>③</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许可设置包头南海子农场之件》,1940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325100)。

<sup>④</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许可设置包头南海子农场之件》,1940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325100)。

<sup>⑤</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许可设置包头南海子农场之件》,1940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325100)。

日,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理事江口顺一致函日本拓务省垦殖局,提出《东洋拓殖株式会社设立包头南海子农场申请书》称“陈者鉴于蒙疆地域食用米当地自给的紧迫性,欲经营以水田开发为主之农场,一方面达到食用米的当地自给,同时对蒙疆的农业开发尽微薄之力。现敬呈包头南海子农场设置计划书,同封随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对本社事业认可之件,事业实施之际,万望多多关照”。<sup>①</sup>

1940年5月,经与伪蒙疆政府协商后,东拓在包头市小文明巷7号设立了东拓包头公所,开始筹建包头农场。原东拓厚和驻在员事务所的大冢朝之负责筹建工作,他首先在包头市南方8公里处的南海小村开垦了20公亩实验田,从日本内地、朝鲜引进了35个耐寒水稻品种,5月上旬开始播种,10月上旬选出了可以在当地种植收获的5个品种。1941年选其中的3个品种进行实验种植,每反(日本土地度量单位,1反等于991.7平方米)的收获量为1石5斗。大冢朝之邀请当地日本驻军、日本领事分馆、日本商社、日本居留民团干部举行品尝会,博得一致好评。<sup>②</sup>随之农场建设进入测量设计阶段,并开始采购工程建筑材料及机械设备。

1939年底制订的包头农场建设计划,可以说进展缓慢。到1943年12月,东拓张家口分店又制订了《包头农场事业计划书》,从该计划中可知,到1943年底,原计划的灌溉、排水以及防水等设施已经建成,但土地盐碱化问题尚未解决。新计划中,水田数量从1000公顷增加到1125公顷,旱田从600公顷减少到225公顷;据调查在该地原住民有170户,新计划移入汉族租佃农从390减少到250户,移入日本指导农民从60减少到12户;汉族租佃农及移入租种农每户租种水田25公顷,旱田5公顷;日本指导移民每户拨给水田50公顷,旱田10公顷,其余作为农场直接经营地经营;工程费、测量设计费、补偿费、农场设备费等,总投资额从147万增到499.6万元;建设期间为1943到1945年。<sup>③</sup>随着战局吃紧,建设材料短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只有近2000公顷的水田开垦基本完成<sup>④</sup>,农场的其余配套工程均未完成。

## 结束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策公司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亦将其实力扩张到西部内蒙古,并在详细调查后,制定了在蒙疆地区发展畜牧业以及开发当地农业资源的庞大计划。东拓为贯彻日本的羊毛国策,在蒙疆设立牧羊场,进行绵羊改良;受驻蒙军之托从1940年起负责收购蒙疆地区内的羊毛、驼毛、皮革等畜产品,以供军需;在萨拉齐附近进行大规模农业调查,计划重新利用原绥远省时代设立的新农实验场、改造民生渠,并计划开发河套地区,设立包头南海子农场,进行水稻实验。从农牧业及畜产经营这一方面对外扩张,为日本的战争经济服务,为侵略中国西北并继续向西扩张做物质准备工作,但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归于失败。

(作者 晓杰,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sup>①</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许可设置包头南海子农场之件》,1940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325100)。

<sup>②</sup> [日]大河内一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的终焉》,东京:绩文堂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152页。

<sup>③</sup>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研修所旧藏记录》,《对于在外商社政府关系机关之融资关系杂件》,1944年(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查询编码B06050432100)。

<sup>④</sup> [日]大河内一雄:《消逝的国策会社东洋拓殖》,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2年版,第260页。